



· 专题论文 ·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 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韩 策

内容提要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曾是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慈禧太后和朝臣为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希望举行乡试。而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尽管张百熙在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支持下，激烈奏驳东南督抚，力主辛丑乡试不可再展，但刘坤一、张之洞既向清廷重申己见，又对各省串联施压，仍坚持乡试展期。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西南、西北等省按期举行乡试，东南各省展期一年，引发士绅舆论颇多争议。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

关键词 科举改制 东南互保 刘坤一 张之洞 张百熙

庚子事变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加速了科举制度变革。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关于辛丑乡试展期问题，目前尚无专题研究。^① 本文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最后的进士：癸卯、甲辰进士群体研究”（2016M59017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对本文的改善大有帮助。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承蒙崔志海研究员悉心指点，谨致谢忱！

① 关晓红曾有所论述，意在说明当局未能把握住借暂停科举以发展学堂的建议和契机，对改科举不无遗憾。（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8页）唯因侧重不同，加以资料限制和解读偶偏，尚有继续探讨的较大空间。本文侧重于朝臣与东南督抚就展期问题的明争暗斗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试图说明展期之争及其结局可视为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一、问题的缘起:奏展乡试朝臣督抚起分歧

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作为抡才大典的乡试、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清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次,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①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巡,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乡试展期之争实与科举改革、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的正科乡试、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然而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清廷遂将恩科乡试、会试分别展期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试、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经简放的乡试考官折回。^②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逃。但乡试、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年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③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④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庚子恩科乡试“一律展缓归并”。^⑤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次展缓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

当日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⑥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⑦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

^① 参见商衍鎤著、商志釋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4页;王立新《咸同年间文闈停科问题考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③ 《大学士崑冈等奏请俟和议就绪再行举办乡试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请将恩正两科乡试归并举行折》(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3—104、105页。

^④ 《恩正两科乡会试请归并举行片》(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8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⑤ 《电谕》(庚子十二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⑥ 《崧蕃来电》(辛丑三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致崧蕃电》(辛丑三月初四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396页。

^⑦ 《崑冈等奏变通简放试差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16—117页。

乡试应行变通事宜”。^①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②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不过,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③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④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⑤督抚接连奏展乡试、会试,既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试、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本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很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尚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竟需停何处,尚未议定。^⑥

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了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对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更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了前几日给崑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过于草率,也将得罪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试、会试一再展期,也会产生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极力要避免的。

因此,刘坤一乡试、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⑦如此既维护了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的意见,以便作进一步决定。

督抚们对此上谕反应不一。江西巡抚李兴锐愿意开科,立即“以江西教案将次办竣,民情安静,电请代奏届期举行”。^⑧刘坤一、张之洞却决定奏请展期。十四日,刘电告张,拟约江苏巡抚聂缉槩、安徽巡抚王之春会奏请展一年,并询问张的意思。^⑨袁世凯亦致电刘、张,询问复奏方略。^⑩

①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22页。

② 《拟致崑冈等电信》(辛丑三月初九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399页。

③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初五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以下《张之洞档》各册均载此辑,不再注出),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页。

④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巳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56页。

⑤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一日酉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399页。

⑥ 《寄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620页。

⑦ 《电谕》(辛丑三月十三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404—405页。关晓红说:“这道上谕,一方面表明政府对士子应试心切的理解和体恤,另一方面则将是是否照前议开科的权力下放给督抚,让各地就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是否举办。”甚是。但接着又说刘坤一“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既不想举行当年科考,又不愿担当停科的罪名,以免失去士心”,却值得推敲。首先,时间逻辑有误。关晓红先论述时间在后的几道谕旨、电奏,然后说这是“一道新的电寄上谕”,以致刘坤一可以“从清廷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窥破当道的心思”,其实该电谕系因刘坤一前日致电军机处而发,此时尚无前后矛盾的几道谕旨。更重要的是,谓清廷当道不愿担当停科罪名则可,谓其此时不想举行当年科考,恐与史实不符。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⑧ 《李兴锐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1册,第515页。

⑨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四日申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485—486页。

⑩ 《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当晚,张之洞复电认为,湖北既需防票匪再行扰乱,也需防考生闹教,故“今年乡试断不能办,拟奏展一年”。张之洞还提醒刘坤一“江西应否同展,似须一询”,同时告以“湖南已电询,尚未复”,并询问袁世凯山东能否开科。^①十五日,刘坤一会同聂、王二抚电奏请展,并电请李兴锐奏展,又将浙江亦请展缓的消息知会张之洞。^②奉旨允准后,刘即于十七日通报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赣抚李兴锐、鲁抚袁世凯、护理浙抚余联沅。^③袁世凯认为山东“必须和局大定,始可议及开科,亦拟请展限”,并强调京师贡院“已毁大半,明春断难会试,乐得从缓”。^④十六日,张之洞添上贡院被毁,明春不能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的说辞,奏请湖北乡试展至次年秋,奉准后又通报相关各省。^⑤这是刘、张最初的串联活动。

然而,也不乏奏请按期乡试的督抚。十六日,来自西安孙宝琦的消息表明,江西、河南、甘肃均请按期举办。^⑥随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奏请按期举行。^⑦有意思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看似意见摇摆,实则不无远见。他认为,按局势自以展缓为妥,但忧虑各省步调不齐而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士心不稳。考生“望试逾年,情甚迫切,如朝廷以俟回銮举行,悉展一年,士子自必安心延企。倘或缓或否,如鄂、湘人士目击滇、黔、桂、粤考官经过,则觐望倍甚,怨谤繁兴,即难保不别生变故”。二是京官、言官的态度。“况京官望试差,一若生、监望乡试,设一二省独请展缓,而言官陈奏,以为可行,辩论纷纭,更伤政体。”因此,俞廉三请示张之洞可否密商刘坤一,“密请降旨,悉展一年。或密约各省,俱请展缓”。张之洞览电赞许,认为如果“顺天、山东、三江、两湖诸大省皆不能乡试,而边省举办,亦欠平允”,更重要的是,“现正义变法,科举必须改章,缓试一年,于考生亦有益”,所以电询刘坤一可否“电商枢垣,一律展期”。^⑧可见,俞廉三在意政令统一和京官、士子的态度;而张之洞意在一律展缓乡试一年,以利其正在努力的科举改章。

不过,因几天前一律展期的提议已被否决,刘坤一了解中枢有意开科,故不愿再牵头饶舌。相反,刘氏希望“各省合力奏请,若请缓者多,纵有一二省仍请举行,朝廷必一律展缓,万无只考一二省之理”。此外,刘坤一对俞廉三担心京官、言官指摘的心理,露出不屑之意:“时局至此,但可就事论事,斟酌办理,至于京官之望差,言官之陈奏,非所敢计。”^⑨只是,刘坤一显然低估了督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仍请按期举行的至少有七省,与奏请展期的省份数量相当。

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在电询江、鄂后,亦请展缓一年。福建、山东、浙江、湖南、江西亦奏准展缓。然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词颇首鼠两端:“倘各省一律举行,湖南自难独异。如沿江省分展缓办理,则湘省亦请展缓一年。”^⑩江西巡抚李兴锐则是迫于刘坤一的压力及邻省环境而奏请展期。^⑪至

① 《致江宁刘制台、济南袁抚台》(辛丑三月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69页。

②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五日午刻、酉刻到),《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五日未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10、511页。

③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4页。

④ 《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210页。《袁世凯全集》误“始可议及”为“始我及”,已据《张之洞档》改。

⑤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0—2211页。《致江宁、四川、福州督署,南昌、济南、杭州、湖南抚署》(辛丑三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4页。

⑥ 《西安孙道致上海盛大臣电》(辛丑三月十六日辰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39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⑧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78—181页。

⑨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七日午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569—570页。

⑩ 《俞廉三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1册,第514页。

⑪ 《李兴锐电》(辛丑三月廿一日缮递),《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1册,第515页。

此,三江、两湖、四川、福建、山东等八省奏准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展至壬寅年秋举行,而云贵、两广、甘肃、陕西、河南等七省则奏请于辛丑年秋按期乡试。直隶、山西因与议和大纲中闹教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条款关系最深,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正与外人进行交涉,故暂未明了。(各省乡试情形详见文末附表)所以,清廷意欲开科的立场受到局势限制,只能折中办理,政令无法统一。围绕乡试是否再次展期,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分歧巨大。这种分歧格局,正是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事实上,东南互保各省因教案而停试的府县甚少,局势也相对安定,更具备按期乡试的条件。如果仔细分析刘坤一、张之洞奏请乡试展期的理由,可以说着眼于外省者多,立足于东南者少,内中只有票匪滋事可以作为长江各省不能乡试的直接理由,而该理由实多夸大渲染。^①况且,沿江省份湖南、江西尚有教案,但此两省巡抚却不反对举行乡试,刘坤一、张之洞主政江苏、湖北并无教案,反而坚持展期。可知刘、张不愿按期乡试必别有其故。

其实,刘坤一、张之洞之所以坚持乡试展期,是因为其“正义变法”,而“科举必须改章”。^②然而,影响重大的科举改章绝非一份奏折、一纸诏书即可了事。不仅士子需要调适准备,政务处、礼部也需要相当时间商订实施细则,并需征求督抚、学政等官员的意见。倘若辛丑年秋按期乡试,次年春会试,正在酝酿中的科举新章则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必将再考一科,科举改章的落实就势必往后拖延。此时改科举摆在新政首位,需要率先推行,故科举改章的拖延,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相反,如展缓乡试、会试一年,作为士子准备科举新章的缓冲期,更利于科举新章获得通过。

所以,从发起新政角度看,这是权谋之计,能做不能说;但从清朝体制讲,乡试、会试一展再展,却是极不寻常的。刘坤一、张之洞更看重改科举、行新政,而对于清廷、朝官及部分督抚,以下几个方面也甚为重要:庚子乱后,乡试、会试接连展期对士子的冲击,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考试对清廷权威的损害,以及清廷急欲通过科举考试收拾人心、提振权威的迫切需要。几个月后,慈禧太后与前河南巡抚于荫霖的对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五年内举行乡试、会试,于荫霖说:“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藉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皇太后曰: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的]话都是当办的事。”^③以故,当刘坤一、张之洞串联东南各省奏请乡试展期后,清廷和朝官集结力量向其“发难”,也就并不意外。

二、乡试万不可再展:张百熙代表朝官诘责东南督抚

庚子乱后,枢垣缺人,瞿鸿禨和张百熙则是朝野瞩目的有力候选人。有意思的是,作为翰林出身的佼佼者,两人双双主张乡试万不可再展。辛丑年三月初,留京的翰林院编修叶昌炽收到行在礼部侍郎陆润庠的私信,获悉瞿鸿禨的立场:“瞿子玖尚书到秦,言各省士气嚣然不靖,乡试万不可再展,欲分为水陆两途,以秦、晋、陇、蜀、齐、豫、滇、黔由行在乘辇而出,其余各省电筒京员由轮船航

^① 富有票案被镇压后,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曾私下说:“南方的叛乱只是一场闹剧而已,主要是报纸借题发挥,大加渲染。……长江一带特别平静。”《法磊斯来函》(1900年12月18日),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以下简称《莫理循书信集》)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②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三月十七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80页。

^③ 于荫霖:《悚斋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263—1264页。关晓红已指出此点,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3页。

海,以省材官供帐。”^①这与崑冈的建议有相通之处。至于张百熙的态度,关晓红已据《德宗实录》,指出张氏认为“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②唯张百熙上奏的表面理据与背后考量,支持和反对张氏的力量分野及争议所在,还可深入挖掘探讨。

三月二十六日,张百熙上奏激烈反对乡试展期,认为现在“和局大致已定,一切照常”,乡试“万不可缓”,故请“特下明诏,所有本年乡试飭各省仍一律按期举行”,借以“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其理由如下。

首先,展缓乡试有碍士子进身、工商生计,影响社会安定。因乡试“业经展缓一年”,士子“观光之志更切”,若再展缓,不肖者“不免觖望生事”。“穷乡僻壤,不知时局,轻信谣言,但闻乡试一停再停,必至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且工商各业皆赖省会士子麇集”,销售货物,流通银钱,“一旦无故停科,不独士子无进身之阶,四民皆有失业之患,恐非国家之福也”。

其次,东南督抚以长江票匪滋事为借口展缓乡试,难以成立。其一,票匪源于广东,而广东三点、三合等会更是防不胜防,但庚子前后张百熙在广东“学政任内,按部考试,并无窒碍”。其二,咸同年间局势更糟,但只要有一隅安堵,即照例考试。“虽当贼氛甚炽之时,而开科各省仍复帖然如故”,曾国藩“甫克金陵,首行乡试,实见及于此”。故“藉考试可以收解散之益,未有因考试而反贻滋蔓之忧者”。其三,“如谓票匪可虑”,则各省防军虽“不足扞御外人,岂并不能弹压内地。况此类匪徒名目,自嘉道以来即已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若如该督抚所陈,是票匪永无净绝之时,即乡试永无举行之日”,恐士民失业而流为匪类,票匪益多,各督抚更将无所为计。此外,“乡试人多易杂,稽察为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各省童试人数也不少,并有较乡试加多者。“若以乡试为必不可行”,难道也令各省学政一律停考正在进行的童试?

最后,张百熙从庚子乱后国势、民心、士心的高度发论,谓国势强弱视乎民心从违,民心从违视乎士心向背,故从来没有“防其士之为乱者”,也没有“因一二人不肖,而遂波及千万人者”。即此次义和团滋事之处概行停考,“尚且分别城镇”,既非“合数省而停之”,也非一省全停,甚至无一府一县全停者。进而,张百熙以代朝廷的口吻责问东南督抚道:“乃以风闻之富有余党,转更甚于有据之义和匪徒,以无事之东南,转更甚于有事之西北。是直令天下士子之心不重为票重为拳,不但驱之为潜图滋事之票匪,且将托名为明目张胆之拳匪矣。各督抚其何术以弭之?朝廷亦将何术以弭之哉?”^③

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的是东南督抚展缓乡试的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激烈奏辞无异于诘责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④

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不久前又分别卸任江苏学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行在,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自然受到清廷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3410页。

②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2页。

③ 以上几段均见《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百熙奏停办乡试有碍大局拟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4—1746页。

④ 《电谕》(辛丑三月二十六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423、424页。

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①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②

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③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④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曾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⑤，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至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再奏展乡试的集结反击。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张百熙为何此时出来挑头？若从政见看，他在此前后有关科举的条陈，系以张之洞戊戌年改科举方案为本^⑥，则与刘、张政见相近。若从人脉看，刘坤一系张百熙同乡前辈，张对刘称侄^⑦，刘则自称与张“属韩、欧旧谊”。^⑧更重要的是，庚辛之交，张百熙在沪与盛宣怀商议后，为与刘坤一、张之洞洽谈，将来内外一心，特意改道襄阳赴陕。^⑨张百熙随后致函刘坤一讨论新政，也默契有加。^⑩那么，张百熙此时公然诘责刘坤一、张之洞，固由其敢言的本性和南书房翰林、左都御史的特殊身份，而与斯时朝廷和东南督抚的权力格局及微妙关系似也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与张百熙颇有联络的盛宣怀却不以张氏此举为然。四月二十日，张致函盛云：“科场事，弟请一律举行，竟与公所见相反。然揣公意，当系欲藉缓办以为变通科举之计，此则适与弟所上条约相符矣。上意当俟鄂督折到，即有明发。”应该说，张百熙此处不无狡辩之嫌，因为从前引其奏疏中看不出借缓办以变通科举之意。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张百熙抵陕后，即探知朝廷变法宗旨，与他和盛宣怀在沪“所商各节颇多扞格”，虽然开特科等谕旨“颇足以鼓舞群情，而三数有权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② 伍铨萃：《北游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版，第199、203页。

③ 《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已刻发、申刻到），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559页。按，编者将发电日期系于四月二十八日，疑误。

④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十二日未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258页。“清河”有可能借“清河王”指王文韶，也可能借西晋陆云的《陆清河集》指礼部侍郎陆润庠。

⑤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024页。

⑥ 参见谭承耕、李龙如校点《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5—16页。

⑦ 《代大学堂发南洋大臣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5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⑧ 《复夏彝恂》（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77页。

⑨ 《盛宣怀致刘坤一》（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2页。

⑩ 《复张整秋》（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日），《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2页。

力者犹不免于韬蔽”,故“亦只好行之以渐耳”。^①这说明与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的急改主张不同,此时朝中掌权者倾向渐改。

可见,张百熙的公开主张,既受到朝中形势制约,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故不无迎合上意及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三数有权力者”之意味。况且,虽然刘、张东南互保居功厥伟,朝廷倚重正深,但据行在归来的吴品珩说,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②,心中不无芥蒂。经过庚子事变,清廷权威已经丧失太多。上年东南督抚公然“抗旨”、形同独立自主不必说,即刘、张一再奏请乡试、会试展期,实亦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朝野上下,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英国汉口总领事都明言,此时东南总督比总理衙门权势更大,即使军机处也不能向他们下命令。^③因此,洋人固然是当前大敌,但慈禧太后、中枢高层亦不会不留意到东南督抚的尾大不掉。事实上,在覆奏新政条陈时,清廷即希望督抚单奏,而不愿其联衔会奏^④,担心出现“要挟”朝廷的状况。故而,张百熙就举国瞩目的科举问题,用激烈言辞诘责东南督抚,虽尚无中枢高层授意的直接证据,却明显有提振中央权威、迎合最高层的意涵。

三、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⑤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覆奏,敬请尊裁。”^⑥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⑦

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⑧张之洞随后亦然。^⑨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面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视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

① 本段见《张百熙致盛宣怀》(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廿日),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6页。

②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3页。

③ 《法磊斯来函》(1901年7月17日),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莫理循书信集》上,第207页。

④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⑤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二十七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档》第86册,第721—722页。

⑥ 《致江宁刘抚台等》(辛丑三月廿八日子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197—199页。

⑦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初四日未刻发、戌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82页。

⑧ 《刘坤一来电》(辛丑四月初七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2册,第16—18页。

⑨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6页。

难易亦大有关系”。^①

与此相应,袁世凯在电奏展缓的同时,也认为各国既以军机大臣“多守旧顽固”,又“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要挟“更换执政”、照行新法,拒之势力不足,允之则国体无存,故“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甚为可虑。故请刘、张“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以图“各国耳目一新”。^②这也是将改科举与尽早推行新政、改善中国形象相联系。不过,这种“挟洋”以急切变法的主张,与清廷中枢的渐改趋向颇有不同。

其实,陷入尴尬的刘坤一此时亦生新招,谋划借奏改科举,以展缓乡试一年。袁世凯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迟至四月十二日,刘坤一奏展乡试的电报已发出五日,仍未奉旨允准。这时南京内外“士心皇皇,多有以仍行开考为请者”,于是有人劝刘坤一主动出击,“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停乡试一年,俾各士子知所从事,磨厉以须,较为得体,借定人心”。^③如此既可推进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又能使本年暂停乡试理由充分,疆臣既免奏展乡试之诮,中枢亦可从容措辞,士子也易于安抚。故刘坤一击节称赏,遂邀张之洞联名会奏。

张之洞亦称赞该主张“洵为定士心之善策”。至于“变法改科举章程”,只能仿其戊戌年已奏准办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西国政治地理,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论说,但声明二场删去声光化电之类专门艺学,“盖照前奏者,取其系已经奉旨成案。将艺学等删去者……以冀易准”。同时必须声明:此乃学堂未设之时取士的权宜之计,迨“学堂广设,实学成就者多,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详细办法当于覆奏内详陈云云。或将陶、袁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④

此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未定稿,刘、张已在筹划先将科举改章奏请明发。刘坤一赞同张之洞的改科举方案,并谓“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⑤于是张之洞拟一奏稿,经刘坤一略改字句,于十七日电奏:“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惟科举要政,当必俟各省奏到,详核妥议。此次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⑥

这是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为全国一律展缓辛丑乡试而提前上奏的改科举主张。既往研究者将此事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混一而论,尚有未谙。^⑦值得注意的是,在奏改科举的同时,刘、张还致电军机处,建议缓放云、贵乡试考官:“科举必须改章,拟请旨先行揭明宗旨,俾多士有所凭依,已另电具奏。惟五月朔即须简放云、贵考官,陕距云、贵较近。现在章程未定,似可稍缓旬日,再行请简。”^⑧这就将刘、张借改科举以展缓本年乡试的意图和盘托出。其如意算盘

①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② 《致西安军机处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午刻发、酉刻到),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414、434页。

③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十二日未刻发、申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258页。

④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未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

⑤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十四日申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321—322页。

⑥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7页;《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亥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7页。

⑦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3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页。

⑧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7—8588页。

是,清廷一旦明发上谕改科举,那么本年乡试各省就立即面临如何考和考什么的问题。清廷很可能就以新改科举,须为士子留出准备时间为由,一律展缓乡试一年。张百熙以定士心为言,刘、张亦以定士心说法,且带出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实为巧妙而有力的反击。

可是,以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张百熙等人为代表的行在重臣,既不以展缓乡试为然,自然不赞同刘、张的新主张。而且,四月十一日孙家鼐亲口告知伍铨萃:“云、贵、两广、陕、甘、汴七省,已奉慈意,准已开科,余省想不能考云。”^①亦即经过全盘考虑和慎重权衡,慈禧太后已同意七省开科,但刘、张的意见也须迁就^②,故东南各省今年仍不能乡试。果然,刘、张请变科举的电奏于四月十九日由军机处缮递,清廷未予采纳,但于二十二日下旨“仍准”东南各省乡试展缓一年。^③至于缓放云、贵考官的建议,早已备好单子的军机处当然不予理睬,不等五月初一,便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简放了。^④难怪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一见上谕,即痛议其非。^⑤

有意思的是,云、贵、两广简放考官后,四川颇受波及,“士子各怀怨望,并有巨绅以陕西乡试改于九月举行,纷请援照办理”。川督奎俊甚欲开科,但“深恐江南、两湖士子有所藉口”,影响江、鄂的安定局面,故电询刘、张:“如本年川办乡试,究与贵省有无窒碍?”^⑥刘坤一接电即复,明确反对四川开科:“乡试事既经两次奉旨展缓,未便再改。且体察沿江情形,亦实遽难开考。自云、贵、两广放考官后,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均已批驳。蜀若开考,江、鄂势处两难。请乐帅仍照奏准之案办理为荷。”^⑦不知何以此电途中耽搁,二十四日下午才到,张之洞此前已电询刘坤一如何答复奎俊。过了好几天,张之洞复电意在反对,然不如刘坤一强势,而是请奎俊裁酌。^⑧这样,四川有意开科的念头被刘、张压制了下去。

由于科举直接联系着无数士子,因此朝臣、督抚围绕乡试是否展期的论争和决策,自然在士绅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回响。

四、士绅舆论对乡试展期的反应

庚子事变导致的前两次乡试展期,已打乱众多士子正常的备考、应考节奏。庚子年夏,新疆巡抚饶应祺得知京师闹义和团,中外宣战,遂急电其子饶凤璜停止赴京赶考,改道南下参加湖北本省乡试。然而,不久又获悉湖北乡试亦展期至次年三月,斟酌再四,饶应祺只好令饶凤璜暂在湖北书院用功,“候明春乡榜”。^⑨随后湖北乡试又经张之洞两次奏展,直到壬寅年八月才补行,距饶凤璜庚子赶考已过两年多,其间焦急等待的心情可以想见。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令一些举人忿恨不已。辛丑年二月初二日,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感慨道:“若非洋寇犯顺,扰乱京都,则去秋之

① 伍铨萃:《北游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第215页。

② 议和中颇需刘坤一、张之洞出力。比如,英国公使萨道义坚持五年内禁止北京举行会试、殿试,军机处恐北京议和大臣李鸿章、奕劻难于力争,故又请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致鄂督电》(辛丑四月十六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436页。

③ 《张之洞、刘坤一来电》(辛丑四月十八日缮,十九日递),《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2册,第78—80页;《电谕》(辛丑四月二十二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440页。

④ 伍铨萃:《北游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39),第222、223页。

⑤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廿七日,第799页。

⑥ 《成都奎制台来电》(辛丑五月二十一日亥刻发、二十二日午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02—203页。

⑦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发、二十四日未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25页。

⑧ 《致江宁刘制台》(辛丑四月二十四日丑刻发),《张之洞档》第19册,第418页;《致四川奎制台、江宁刘制台》(辛丑四月廿九日),《张之洞档》第35册,第318页。

⑨ 《饶应祺电报》(庚子),李德龙编:《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第22册,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19页。

乡试不停,今春之会试莫止矣……身未能诣都应礼闈试,而乃形诸梦寐中。”^①

迨辛丑年三四月间,当朝臣与东南督抚争论是否再展乡试时,报刊舆论成为影响时人行止、心态的重要因素。三月底,报刊纷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刘坤一亦以为然,奉旨允准。《申报》称:“和议条约中有闹教省分停止大小考试五年一条,朝廷已准如所请。江南一省原不在停试之内,而全权大臣李傅相不知是何意见,忽奏请一律停试,两江督宪刘岷帅亦以为然,刻已奉旨允准。”^②同日,《中外日报》亦有类似传闻,且与改科举相联系:“江督刘制军以新政将兴,科举必变,士子安常习故,猝难更张,适全权大臣李傅相奏请将各省考试全停五年,刘制军遂亦以傅相之言封章入告,俾八股中人,得乘五年之中改习时务实学。昨奉上谕,准如所请。”^③两天之后,《申报》评论大加赞赏,并倡议停试后应大开学堂。^④《台湾日日新报》随后亦有相似报道,也以停试可为兴学堂创造机会为言。^⑤外文报纸的评论,则认为此举“不过欲全中国政府之体面,使华民以停止试事非出于洋人之命,乃中国政府之意耳”。^⑥

其实,三月初八日以前,在京的朱益藩已“闻有旨明发,各项考试一律停办五年”。^⑦然而,事实上并无相关谕旨。李鸿章或许私下表达过类似意见,但不大可能形诸奏章,清廷更难俞允。因为停试本就是外人逼迫所致,即使清廷主动下旨通国停试五年,无疑也是掩耳盗铃,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倘如此,则既令天下士子寒心,也使清廷权威丧尽。况且,由于下届乡试、会试就是慈禧太后“万寿恩科”,故军机处早就敦嘱全权大臣,如果外人议及乡试、会试停科,须指明滋事“州县不准予考,如牵涉全省,务须设法顾全”。^⑧甚至连李鸿章的女婿兼谈判助手张佩纶也愤愤地讲,外人要挟直隶、山西停试五年,不准京师乡试、会试、殿试,将“大失士心”。^⑨遑论主动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其实,李鸿章等正在为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努力交涉^⑩,不可能贸然奏请一律停考五年。至于刘坤一,只要注意到三月初为奏请乡试展期一年,已经小心翼翼地请荣禄由内面奏,就可推知,他更不会奏请一律停科举五年。直到四月初十日,刘坤一尚不清楚李鸿章与外人就停试问题商议到了何种程度。^⑪

因此,若说当时官员、士人、报刊有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的议论则可,若据此而谓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则是不确实的。既然并无此事,若说统一停考五年的主张以及借停考以兴学堂的思路被张百熙的上奏打断,也就与史实不符。^⑫如前所述,张百熙所奏乃是针对东南督抚奏展辛丑乡试一年而发,并非针对全国停试五年。

进言之,不必说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即刘坤一、张之洞等奏展乡试一年,已在士绅舆论中引起颇

①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辛丑二月初二日,《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79页。

② 《停试述闻》,《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七日,第1版。

③ 《时事要闻》,上海《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七日,第1版。

④ 《停考后必须广开学堂说》,《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九日,第1版。

⑤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1页。

⑥ 《论中国停试事》(原刊《文汇报》),上海《中外日报》译载,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第1版。

⑦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第3410页。

⑧ 《军机大臣致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1页。

⑨ 《致鹿崧砚尚书》(约辛丑三月),张佩纶:《涧于集·书牍》第6卷,涧于草堂1926年刻本。

⑩ 参见边文峰《萨道义与辛丑条约谈判中取消北京会试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02—103页。

⑪ 《江宁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九日)、《寄南京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十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26页。

⑫ 相关说法见关晓红《停废科举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1—52页。

多争议。湖南名儒皮锡瑞虽然倾向于废科举、兴学堂,但当他听闻江、皖、湖广请停本年乡试时,却“以为非计”,也是从人心、士心、士子读书进身方面着眼。当听说张百熙奏请仍行本年乡试,朝廷令督抚再行体察覆奏后,皮锡瑞论道:“不知诸公不护前否”。^①显然是希望本年乡试仍旧举行。留京的浙籍士人冯汝琪因浙江乡试展期,“南北两闹今年已无指望,此后举行特科,改试策论”,不免觉得“科甲之心可以从此绝望矣”。其浙江亲戚此前也来信“抱屈”。^②

在南京,刘坤一奏展乡试一年后,“一时士林中人谣言四起,爰由省垣某巨绅联合同志会议于某书院中,拟就条陈洋洋二千余言,禀请制军吁乞天恩,照常考试”。^③四日后,以濮文暹(青士)太守、陈光宇(御三)太史领衔的进士、举人20多人所上禀牍,登上《申报》,吁请本年按期乡试。其理由有四:其一,再缓乡试,士子将“皇皇如失所恃”,“弦歌之声将辍”,而商民亦以“屡年不举乡试,生计愈艰”。其二,“缓试之故,一因教案牵连,一因票匪蠢动”,但在刘坤一领导下,“拳匪肇衅之后,本省无一教案。康、梁滋事以后,本省无一票匪之案……苟亦如他省之因教案而停科举,何以劝善”。其三,如谓“两宫尚未回銮,乡试似属不急之务”,然当年洪杨之乱,江苏、安徽大半沦陷,咸丰皇帝允疆臣之请,借闹浙江举行己未科江南乡试,“维时两省流离被难之人,读诏书而感泣,事竟亦帖然。今两省皆无恙,而忽然停试,似不足以慰士心”。其四,现在赶办供给,完全来得及举行乡试。最后,强调科举维持士心民风:“自近日邪说横行,士心浮动,不复守其业,造作谣言,一倡百和。其所恃以维系者,惟此科举之一途。若复令其绝望,聪明才辨之士进取之心既懈,流弊甚多,于士习民风关系实非浅鲜。”^④与张百熙条奏理由颇有相通之处。

有意思的是,《申报》三日后又发表题为《展缓乡试之善》的社论,似针对前引禀牍。其要点有三:首先,展缓试期可以为科举改章提供时机。科举中八股、试帖和小楷流弊甚大,故“欲取人才,非变通科举不可。然变通必有其机,机之未来,虽有意变通,而必多捍格。戊戌之事其明证也。去岁拳匪事起,外人要约指明闹教之处停试五年。既而朝廷允疆吏之请,各省乡试一律展缓一年。此即变通科举之机也”。因此批评要求辛丑年秋举行乡试者“不识时务、不顾大局”。其次,一一反驳士心、民风、商务、生计等理由,进而指出展缓乡试有三善:一是省经费,对各省筹款不无小补;二是匪徒借乡试滋事,停试可以绥靖地方;三是既奉经济特科之诏,科举必改章,乘此停试时期,士子可以埋头向学,“一旦科举既改,庶不致茫无头绪”。再次,针对停试之意出自外人,未曾发生教案地方大批士子无端被累,士心难服的质疑,评论解释道:“若允外人之请,分别停试,固不足以服士子之心。而此则一概停试,是出自疆吏之深心、庙谟之独运,与外人无与也。”^⑤意谓一概停试,可以左右逢源。考虑到刘坤一、张之洞此时正在奏请明谕变科举,以便一律展缓乡试一年,此社论似在为其张目。^⑥不过,三天之后《申报》又刊社论,呼吁江南举行乡试。一则称,江南人士与外人和平相处,故“半壁东南最臻安谧”,忽然停试,说不过去。再则谓,云贵等省既举行

①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廿二日、四月廿二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版,第380—381、398—399页。

② 《冯汝琪致冯金鳌》(辛丑六月十四日),《冯汝琪家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03。

③ 《请行秋试》,《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第2版。

④ 《请行乡试禀牍》,《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第2版。

⑤ 《论展缓乡试之善》,《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第1版。

⑥ 目前尚无刘坤一与《申报》幕后交易的直接证据,但早在1898年11月,刘坤一就化名“江南人”,在《申报》登文章反驳康有为对慈禧的攻击(参见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1901年,刘氏又在上海报界“制造舆论”:删改电报,嘱咐上海道袁树勳“登入洋报”,为荣禄“辩诬止谤”。《刘坤一致荣禄函》(辛丑),《荣禄档六》,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69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乡试,则江南停试有失公平。^①

西南、西北各省举行乡试的事实,对长江各省产生持续冲击。四五月间,云贵、两广放乡试考官后,四川“士子各怀怨望”,听闻陕西缓至九月乡试,巨绅又请奎俊援案举行。^②五月,“南京各书院诸生”公恳巨绅致函刘坤一,“请今秋仍举行乡试”,只是刘坤一“坚持不允”。^③同时,“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但均遭批驳。^④张之洞虽然奏称缓试“官绅众论皆同”^⑤,其实云贵放考官后,湖北省城“各绅邀集学校中人公禀督轅,请仍循例举行”,也认为湖北并未闹教,“今若将秋闱展缓,竟与他省之因教案而罚停科举者无分,深恐民心无从折服”。^⑥其理由与南京士绅相类。因此,刘、张坚持乡试展期,在东南士绅舆论中颇有争议,似亦不得人心。

结论

清末新政伊始,朝臣与东南督抚围绕乡试展期的明争暗斗复杂微妙,远超既有认知。辛丑东南各省乡试最终展期一年,是刘坤一、张之洞立场的体现,是其向清廷坚持己见,对各省串联施压的结果。刘、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正筹划新政变法,而改科举为新政首务。如辛丑乡试按期举行,则科举新章颇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势必再考一科而延续生命,科举改革的落实必然延后。如此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至于说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因张百熙反对而作罢,并不符合史实和情理。

然而,慈禧太后和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根据大乱之后迅速开科的历史经验,希望举行乡试,以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与刘坤一、张之洞意见冲突。张百熙于是代表朝官群体激烈奏驳刘坤一、张之洞,力主乡试万不可再展。但在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在清廷和洋人之间机敏应付,形成第三势力。^⑦清廷虽有不满,却不得不倚重和迁就。最终东南各省辛丑乡试再次展期,西南、西北等省则按期举行。双方主张均未实现。清廷希望通过科举大典以稳定士心、重拾权威的思路和努力,遭遇重大挑战,其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制约。从坚持己见并串联东南各省与清廷立异角度看,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两宫回銮后“解决”东南尾大不掉问题,也就成了政局变迁的一支暗流。

各省辛丑乡试情形表

类别	省份	辛丑乡试举行情形	正副考官
条约停试	直隶(顺天)	壬寅年八月借闈河南补行	裕德、陆润庠、陈邦瑞、李联芳
	山西	壬寅年八月秦、晋合闈补行	曹福元、杨士燮

① 《江南仍宜举行乡试说》,《申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1版。

② 《成都奎制台来电》(辛丑五月二十一日亥刻发、二十二日午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02页。

③ 《时事要闻》,上海《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一日,第1版。

④ 《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发、二十四日未刻到),《张之洞档》第88册,第225页。

⑤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子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16页。

⑥ 《志切观光》,上海《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第2版。

⑦ 王光祈译,刘鑫宁整理:《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2页。

续表

类别	省份	辛丑乡试举行情形	正副考官
坚持展期	山东	壬寅年八月补行	支恒荣、陈伯陶
	江南(江苏、安徽合闱)	壬寅年八月补行	戴鸿慈、黄均隆
	浙江	壬寅年八月补行	朱益藩、李家驹
	福建	壬寅年八月补行	载昌、吴荫培
	湖北	壬寅年八月补行	宝熙、沈曾桐
意见摇摆	湖南	奏请如全国一律按期举行,湖南亦举行;如沿江省份展缓一年,湖南亦然。壬寅年八月补行。	李士钤、夏同龢
	四川	有意奏请辛丑年九月补行,受刘坤一、张之洞压力而取消念头。壬寅年八月补行。	毓隆、俞陛云
	江西	起初奏请举行,后因刘坤一压力及邻省环境,又奏请展至次年。壬寅年八月补行。	李昭炜、顾瑗
	河南	起初奏请举行,后因筹办回銮大典奏请展至次年。又因顺天乡试借闱河南开封贡院,故壬寅年十月补行。	定成、景方昶
	陕西	起初奏请举行,后因筹办回銮大典奏请展至十月举行,最终奏请展至次年。壬寅年八月补行。	朱延熙、段友兰
坚持举行	广东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裴维俊、夏孙桐
	广西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李传元、伍铨萃
	云南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吴鲁、冯恩崑
	贵州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吕佩芬、华学澜
	甘肃	辛丑年八月按期举行	饶士端、郑沅

资料来源:据《上谕档》《德宗实录》《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张之洞档》《清秘述闻》等材料编制而成。

说明:1. 辛丑八月乡试全称为“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补行庚子恩科乡试”,壬寅八月乡试全称为“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2. 辛丑八月各乡试仍用八股文(四书五经)、试帖诗、策论考试;壬寅补行各乡试施行科举新章,皆用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术策、四书五经义考试。3. 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直隶、山西五年内举行乡、会试,故顺天乡试借闱河南,河南乡试延后两月,山西乡试借闱陕西,秦晋合闱。

[作者韩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100006,hanc_1986@163.com]

(责任编辑:杨宏)